

3

國外文學

北京大學

国外文学

GUO WAI WEN X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第3期

国外文学

目 录

- 漫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彭克巽 (1)
- 试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刘建中 (15)
- 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樊锦鑫 (37)
- 一种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
- 谈结构主义文艺批评……………王泰来 (58)
- 苏联文学论争概述 (二) ……………[苏]维·泽·罗戈宾 (68)
- 陆嘉玉译
- 近年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英]马克·辛菲尔德 (94)
- 胡家峦译
- 对东南亚各岛国的文学也要进行比较研究……………
- ……………[法]德尼斯·龙巴 (120)
- 颜保译
- 日本文学介绍 (上) ……………刘振瀛 (128)
- 爱丽舍田园大街 (中篇小说) ……………[法]吉尔贝·塞斯布隆 (160)
- 徐继曾 宋维洲译
- 游园会 (短篇小说) ……………[英]卡瑟琳·曼斯菲尔德 (195)
- 钟林译
- 卡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她的《游园会》……………钟林 (213)
- 男角四下 (短篇小说) ……………[越]阮公欢 (219)
- 卢蔚秋译
- 精通葬礼的人 (短篇小说) ……………[日]川端康成 (229)
- 肖红燕译
- 《莱蒙托夫百科全书》浅介……………顾蕴璞 (239)
-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举行第三次理事 (扩大) 会议… (明) (244)
- 巴勒斯坦诗抄……………仲跻昆译 (247)

漫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

彭克巽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文学的影响问题是一个很复杂而又很有意义的题目。现代的世界评论尽管众说纷纭，但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本世纪的世界文学，尤其是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影响的性质是怎样的？它有哪些积极面和消极面？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世界上有不少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进行过评价。更有许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感到强烈兴趣的作家、译者和研究者发表过有关他的论文、演讲以及专著。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比较分析的丰富材料。笔者拟就自己接触到的若干材料，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一

据苏联科学院195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称，这位小说家的作品最早被翻译介绍到西欧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与托尔斯泰作品传入西欧几乎在同一时期。在短暂的五、六年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作品的法文译本相继问世：1884年翻译出版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罪与罚》，1886年《死屋手记》和《恶魔》，1887年《白痴》，一八八八年《穷人》，1890年出版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节译本等等。而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法译本分别出

版于1884年和1885年。

法兰西学院的研究者沃盖 (E.-M. de Vogüé) 在1886年发表《俄罗斯小说》一书，对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五位小说家作了评介。在《忍耐的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章中，沃盖指出：“只要看一看《罪与罚》中马尔美拉多夫的故事，囚徒们的肖像及其生活图画，就能明白没有人把现实主义推到更前面；只要看一看《白痴》中的所有人物，就会明白没有人敢这样涉猎于幻想领域”。沃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实而冷酷地描绘了生活的现实”，“以超人的毅力寻求实现福音书的某种新途径”，因而他的创作可以称为“神秘主义的现实主义”。沃盖说人们可以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哲学家、圣者使徒、精神病者、苦恼的安慰者”等等，但每一个单独的称呼都是不充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性格，那就是“慈善修女的心和大审问官的精神”；他是“游历整个世界并卓越地描述了所看到的一切的旅行者”，但是是一个“暗夜”旅行者，因为他“只写过两种书：苦难的书和恐怖的书”。沃盖的结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法国人揭示了他们所陌生的“异邦人的灵魂”和更为坚强的渴望和忍耐的性格”；他的小说不是象法国那种轻松的小说，而是“唤起关于忍耐和永恒的联想”的小说。沃盖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显著的矛盾，但往往将它归结为“异邦人的灵魂”、“另一世界的现象”、“怪物”，同时又惊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沃盖曾三次见过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亲眼看到他在当时的俄国日益增强的影响。沃盖说：“屠格涅夫的文艺权威不公平地下降了；托尔斯泰的哲学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抓住了人心，他的方向在现代运动中的作用恐怕是最为强烈的。”^①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影响的性质和前景，沃盖却没有做出分析。

① 《Le Roman Russe》（《俄罗斯小说》），1927年第20版，巴黎，第267—272页。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法译本开始在西欧流传时、做出最激烈反响的要数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尼采。他在1887年第一次从法译本读到《地下室手记》等作品后，曾激动地说：“就象我在二十三岁时发现叔本华，在三十五岁时发现司汤达那样，当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立即听到了血缘本能的呼声，而我的心欢乐地跳动起来”。^①由于尼采曾经这样地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师，便产生了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的研究课题。

尼采形成他的超人哲学思想体系是在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尼采的代表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于1883—1885年间，提出了“上帝已经死亡。因此现在我们的愿望便是超人的生存”这一基本命题。尼采是在这以后，1887年，接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作品，从而引起他对“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敬意”。^②在读过《死屋手记》后的1888年，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论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化和畸形化必然使“那些粗野的大自然之子”演变为反叛者时，举出“拿破仑是一个明证”，接着又说：“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例证。附带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那里学到某些东西的唯一的心理学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偶然事件，比发现司汤达更使我感到幸福。这是一个深刻的人，十分正确地论证了浅薄的德国人的粗俗。他曾在西伯利亚犯人当中生活了许多年，却意外地发现了那些完全绝望的、再也不能返回社会的犯人是俄罗斯土壤上所能生长的最优质、最结实和最珍贵的树木上被砍下来的树枝”。^③

① 见Henri de Lubac, 《Dostoievski Prophète》（《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945年版日译本。

② 见Г.Фридленде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1979年莫斯科版。

③ 同上。

尼采从他的“超人”哲学出发，鄙视那些伪善的道德家、追名逐利的“市场的苍蝇”等等，讴歌那些敢于蔑视旧的道德伦理标准，去创造新的价值观念的“强者”、“超人”。而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死屋手记》中某些囚徒、《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恶魔》中的斯塔甫洛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等一系列重要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超人”和唯意志论者的特色。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尼采提供了一系列“超人”和唯意志论者的艺术形象和心理典型。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同尼采的思想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他们的思想的内涵有着鲜明的区别。尼采对“超人”的寻求，是为了论证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将个人意志和权力欲望绝对化，实质上是宣扬一种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心理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是在一种实验小说的艺术探索中，在生活现实的戏剧中，去剖析和论证唯意志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必然崩溃。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惯主张“个性自由”、“个人意志”的。以《穷人》而登上文坛的这位小说家，是一个小人物的个性自由、生活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热烈维护者，这个思想倾向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大厦的一块基石。然而，他在十九世纪俄国和西欧历史中看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如何演变为争权夺利的血腥斗争。他不是向前进，而是倒退到原始基督教的乌托邦幻想中去。他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一系列同“超人”对立的形象（如《罪与罚》的索尼娅、《白痴》的主人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等等），就是为了寻求“个性自由”、“个人意志”、“个人尊严”的发展，能够具备象基督那样“博爱”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美好”品格的可能性。从抹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仅仅强调“人格意志”的作用这点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尼采一样陷入唯意志论，同时还带上了强烈的宗教色彩。但是，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整个创作又是对于尼采那种寻求少数强者和“超人”的权力意志的非常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闪烁着现实主义艺术的光辉。

二

紧接法国之后，德国和英国相继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德国于1907—1912年间刊行了第一套德文版的二十三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在英国，由名翻译家加尼科夫翻译的十二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也于1912—1920年间问世。稍后，日本于1917—1921年间出版了新潮社版的第一套十七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前后的世界动荡和革命变革的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流达到一个高潮。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危机，掠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被赶上战场的善良的人在战争中的痛苦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使许多作家对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的深刻批判者、人类苦难的悲剧的描绘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强烈兴趣。著名的德国作家黑赛在二十年代初期说：“我觉得欧洲青年至少是德国青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歌德、甚至也不是尼采看作自己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对我们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只要看一看近年来的诗歌，便可知处处尽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构思”。^①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年代初期在欧洲影响之一斑。黑赛还说过，他们并不是评论哪个作家更伟大，“歌德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也不比他‘更渺小’”，只不过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光亮“照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许诺更多的温暖”。^②

黑赛在1915—1925年间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或欧洲的日暮》等五篇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黑赛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

① 见 Г. Фридлендер：《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1979年莫斯科版。

② 莫斯科《新世界》杂志，1981年第10期第220页。

的价值在于其主人公都不仅是为个人问题而苦恼受难，而是为整个一代人、甚至是为整个民族和整个世界而苦恼受难；而这种“高度的人道主义”在欧洲已经丧失。但是，黑赛是以唯心史观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得出结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在心灵的战场上展开魔鬼和上帝的斗争的主人公（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等等）正是“新道德、新伦理和新人类的先驱者”。黑赛惊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人格严重分裂，凶手和审判官，粗暴汉和温柔的心，完完全全的利己主义者和真正的自我牺牲的英雄”^①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共存；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心灵中的上帝战胜心灵中的魔鬼的模式。这样，关键就是人的心灵同上帝的交往，象《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那样用心灵去拥抱“上帝的万千世界”。一般评论都认为黑赛的创作（尤其是1927年的长篇小说《草原狼》）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影响。结合以上评论来看，这种影响既有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又有宗教神秘主义的消极方面。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欧的影响，还因为是他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由于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危机，而引起人们的深思。奥地利进步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26年12月给高尔基的信中曾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象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那样，再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也许，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化得太急剧了，不能以一瞥概其全貌”。^②茨威格于1920年发表论文集《三大师》，对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进行过比较。茨威格指出，“对于狄更斯的人物来说，一切追求的目的只是大自然怀抱里一座漂亮的别墅和绕膝欢跃的一群儿女；巴尔扎克的人物所热中的是高楼大厦、贵族头衔和百万财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中有谁追求这些呢？谁也没有。他们不愿停留在任何地方——甚

① 莫斯科《新世界》杂志，1981年，第10期第220页。

② 《三人书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至在幸福上。他们总是渴望走得更远些，他们都怀着一颗折磨他们的‘火热的心’”。茨威格进一步概括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总是在人的灵魂深处、在精神的世界中展开的。……他的每一个主人公都象俄罗斯本身那样询问自己：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他渴望认识站在上帝面前的那个他自己，而且想审问自己。……正是在这里，在这个为真正的‘我’的斗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到高度的紧张性”。^①正是对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深刻批判和对真正的人生的不倦探索，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魅力，吸引了处在精神彷徨时期的一些欧洲作家，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结论是宗教乌托邦的、是反动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欧文学影响的一个著名事实是法国作家纪德1922年在巴黎旧哥伦比亚剧院所作的系列演讲。在这个长篇演讲中，纪德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托尔斯泰高峰遮住了的更高峰”，认为在整个西欧文学中再也“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触及的问题更为深刻的问题”；“如果说西欧文学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理的是人与其自身或人与上帝的关系，这正是他卓越的地方”等等。纪德崇拜和鼓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神秘主义，说：“尼采为嘲笑福音书的欲望所折磨，写出《反基督》一书，企图成为基督的竞争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跪拜在基督面前，接受福音书的教诲”。纪德总的评论就是这样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过，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也作过一些精辟的概括。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是从臆测的思想出发，而是从观念和事实的邂逅出发，这种混合天衣无缝”；它象伦勃朗的绘画那样将人物和事件聚在一起，由一个侧面给予强烈光芒”^②等等。纪德的小说《梵蒂冈的地窖》（1914）等等被认为是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作品。

① 见Г.Фридлендер：《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参见《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6页。

② 见纪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日译本。

还在1905年，高尔基在《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中就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其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同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而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高尔基认为这些“不好的影响”就是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的说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宗教的“顺从”和“忍耐”的宣扬。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的艺术力量确实震撼了二十年代西欧文坛，同时他思想中的消极方面也确实产生了坏影响。

在二十年代西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弗洛伊德的论述。他企图以精神病理学分析方法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在1920年十月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不靠精神分析法就不能理解的存在。……他通过每一登场人物、每一篇文章，亲自阐明了什么是精神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问题，即弑父问题为主题，以行为和犯罪意识之间的矛盾相克为主题的，这个事实仅仅是一例”。弗洛伊德甚至认为“也许可以用歇斯底里来表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形象”。^①在1928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中，弗洛伊德继续阐述了这些观点。弗洛伊德的病理学、生物学分析实际上阉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同时这位病理学家所利用的材料中还有许多误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材料（如，1918年在德国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女儿柳勃芙的回忆录，1926年慕尼黑出版的《轮盘赌场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屏弃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等荒谬观点，批判地吸取其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等心理学研究中的合理因素，那末还是可为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心理过

① 见小此木启吾（日本）编译《弗洛伊德选集》。

程提供借鑑的。例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为家庭丑闻弄得非常烦恼，“却弄不清烦恼的是什么”，心想“不去想它了”，及至走到其父亲家宅门口看见仆人斯麦尔佳科夫，顿时发觉使他苦恼的原因就是这个仆人（即在他身上体现的伊凡自己的弑父意念）等等的描写，就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心理学现象。

三

在日本，1913年8月，白桦派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读到刚刚问世的《罪与罚》日译本时，给志贺直哉写信说，他“噙着眼泪”读完了它，“所有的登场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其中，母亲虽说是最最普通的人物，却那么出色地体现了深沉而生动的父亲品质。我正在寻思怎么能写到这一步的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富于人情味的人物形象塑造使日本作家产生了浓厚兴趣。

名作家夏目漱石也早在本世纪初就研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小品文《往事回忆》（1912）、小说《明暗》（1926）中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超过屠格涅夫的艺术家的”，并揣摩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癫痫病发作前的恍惚的精神状态，关于生与死的体验等等。夏目漱石说，“我经常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连不断地想来想去。非常耐心地将寒冷的天空，新的刑坛、他站在刑坛上的姿态、他只穿着一件衬衣在发抖的姿势描绘来描绘去。”^①夏目漱石反复考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生与死的经历同他的创作的关系。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九一四年日本出版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警句集》，序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不，是兄弟”。编者丹洁是献给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给民众》的作者。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穷人的人道主义突出地展现在一个东方作者眼前，在他眼中同高尔基的形象相交错。^②

① 见清水孝纯《日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本》。

② 《漱石全集》东京1975年版第8卷第331页。

在我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卓越的评论者是鲁迅。1926年鲁迅校对了素园译的我国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完整译本《穷人》，在译本《小引》中说这位小说家是“显示灵魂的深者”，“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鲁迅充分肯定了作为人类灵魂深刻探索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在三十年代的评论中，鲁迅回忆他年轻时候敬服而又总不能爱的两个作家，说他们就是但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似的；同时也批判了他的“忍从”观点。然而鲁迅还深刻地批驳了一些医学者以病态心理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倾向。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1935）中写道：“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吧”。鲁迅非常深刻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充满矛盾的灵 魂 世界，是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透彻批判。正因为它震撼了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有些人便以“病态”来回敬作者，这“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的了。而鲁迅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情，快要破裂的忍从”，是对这位小说家创作的卓越概括，十分精辟地评述了充满矛盾对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

一九二七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第四册）中评介陀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伟大，乃在悬深的人道精神，乃在他的为被侮辱的人，为被人不齿的上帝之子说话”。郑振铎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开拓了描写被侮辱的人这个文学新领域，他怀着“满腔同情去写他们，他有了这伟大的爱的精神，而他的小说，便自然而然的在字里行间潜伏着一种最感人的感动力”。可见，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压迫下的旧中国进步文学界首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看到的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厚同情这一积极方面，而不是去宣扬作者的宗教神秘主义。正如鲁迅所说，“作为中国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从”。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并不是这位小说家的代表作，但是一九三四年邵荃麟的译本却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在中国一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除想起《罪与罚》外，便会想起《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这本书。这正好说明读者把他看作“穷人的朋友”。

四

十月革命后，象征派的反动文人梅烈日科夫斯基流亡西欧。他在中学生时代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一面之识。他的著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竭力宣扬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神秘主义的一面，在西欧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十年代的苏联新文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展开了多方面的严肃的研究。1922年起，由Л·格罗斯曼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资料丛刊》相继问世，纠正了西欧某些谬种误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材料。1928年，属于形式主义学派的研究者巴赫金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提出这位小说家艺术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复调”结构的理论，曾在苏联内外产生广泛反响。1926—1930年间，苏联国家出版社刊行了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一般公认，苏联一些作家（如列昂诺夫、费定等）的创作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影响。

高尔基一贯坚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分析的立场。在前文中已指出,高尔基在1905年的文章中,既肯定他天才的艺术力量,又尖锐地指出其“顺从”、“忍耐”观点的危害性。高尔基没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排除在卓越的俄国古典作家的行列之外,在1931年为列昂诺夫小说《獾》法文本所写的序中说:列昂诺夫是“现代苏联文学中继承普希金、格利鲍耶多夫、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事业的那一学派的最大代表之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欧的影响,高尔基认为这个小说家“对于欧洲小市民的‘精神均衡’起着破坏作用”,具有冲击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艺术力量,同时又认为不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分抬高(见《论文学》,1930年)。高尔基一贯反对渲染苦难,把描写苦难、同情作为文学的主要课题。1936年3月,他在给左琴科的信中说:“你能不能用你的幽默嘲讽一下苦难这个被许多人所心爱的对象呢?……苦难,这是世界的耻辱,应当去憎恨它,为的是消除它”。高尔基认为苦难这一主题是“从宗教思想进入艺术领域,成为艺术的基本主题的,其结果艺术语言降低成为怜悯词句的施舍”。^①高尔基的观点反映新兴无产阶级铲除人间一切苦难的坚强信心和革命乐观主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其思想的深刻矛盾,往往渲染苦难,绘声绘色地描写苦难。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是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

但是,如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是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三十年代后半期,在苏联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不再出版,对他的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六十年代起,苏联出现了重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浪潮。

五

西方评论认为世界上恐怕没有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

^① 参见《高尔基文学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下卷第409-410页。

受到那末多不同的评价，并且周期性地引起阵阵“热潮”的了。继二十年代西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潮”之后，比较突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出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潮”。在由于法西斯侵略而引起的战争中蒙受苦难、或被迫充当了侵略工具的广大知识阶层中总结经验和反省自己的呼声日益高涨。日本研究者既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中关于正教俄罗斯的历史使命的反动说教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来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中照见了自己“去掉伪装的灵魂的真面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真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现象。这样，在战后的日本，《罪与罚》于1948年和1963年重新成为日本的最畅销书。

在欧美，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战前后出现的存在主义思潮连系起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入重要的文学研究课题。1972年美国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称：“作为存在主义的一名先驱，人们经常逐字逐句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语。因为在他对唯理人道主义的幻灭中强调了宇宙的不可预测的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存在主义的一名先驱”？这又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

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家加缪在1943年发表论著《西西弗斯的神话》，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存在主义小说家”。许多研究者指出，加缪的小说《局外人》（1942）、《鼠疫》（1947）、《堕落》（1956）在思想主题和灵魂世界的描绘上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影响。1959年，加缪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小说《恶魔》改编为剧本。

《西西弗斯神话》中的《荒诞的创作》是加缪专门论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章节。加缪说：“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询问自己，如同询问生活的意义那样。在这点上他们都是现代的，因为他们不怕可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探索这

个世界的结果，认为它是荒谬的，“而恐怕没有一个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赋予荒诞的世界这样亲切而折磨人的魅力”。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让他的虔诚、博爱的主人公（如阿辽沙来击败他的荒诞和反叛的主人公（如伊凡），因此“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位荒诞派小说家而是一位存在主义小说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加缪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情是在荒诞和反叛的主人公方面。

从《荒诞的创作》一章中可以看到加缪的思想是在世界大战的动乱中既批判帝国主义战争又对人类和个人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的知识分子情绪的表现。他认为战争在未来也不可避免，而人们不得不违心地充当其工具，就象“西西弗斯神话”中那样命中注定要永远地推石头上山，循环不息。加缪强调长期积累下来的现实生活矛盾是难于改变的存在，低估改变现实的理想的力量。他甚至认为“创作还是不创作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此截然不同。他强调艺术是“对理想的永恒探索”， he 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理想家”。他以他的全部热情剖析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种种思潮，描绘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世界。虽然他做出了宗教唯心史观的错误和反动结论，但并没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的一生描写的是“地下室的悲剧”，这些主人公渴望美好生活，但又沾染社会陋俗，以为所有人都那样，自己何必改正。陀思妥耶夫斯基盼望先驱者的出现，但正如前面已经屡次提到的那样，他所寻求的是宗教乌托邦的“新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影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只涉及其中若干问题，而且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和分析。

^①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西西弗斯神话》），伦敦英译本，1961年版，第77—95页。